

# 城乡民生三感分化与体育参与行为差异： “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证分析

樊荣<sup>1</sup>, 孙昌荣<sup>1</sup>, 胡月<sup>2</sup>, 薛文浩<sup>1</sup>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2.天津体育学院 教育与心理学院, 天津 300202)

**摘 要:** 将体育内化为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是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 也是探讨城乡居民社会心态与体育参与行为关系的核心旨归。高层次的心态是否必然会带来更高水平的体育参与?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数据( $N=26\,338$ ), 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PA)识别城乡居民“民生三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潜在类型, 并比较不同群体的体育参与行为差异。研究认为, 城市三感分化差异大, 乡村分化相对同质; 均衡型三感群体中, 中三感型体育参与最优, 高三感型次之, 中低三感型最低。但剔除非体育参与者后, 市民的结果出现反转, 高三感群体优势凸显, 乡村则无变化; 非均衡型三感群体中, 幸福感突出型的体育参与水平最高, 幸福感缺失型次之, 低三感型最低, 且剔除非参与者后结果依然稳健。启示: 城乡体育政策应避免“一刀切”, 需以社会心态为导向, 因地、因群施策, 推动个体现实生活机会与心理状态的有效衔接, 培育更均衡的高层次社会心态。同时, 破除高心态群体的参与障碍, 引导其主动参与, 以优化其体育参与行为。此外, 优先改善非均衡心态群体的生活预期与现实匹配度, 有助于提升其体育参与水平。最后, 在中观心态框架下, 将民生三感纳入体育分层研究所提供的经验证据, 有利于促进国民体育参与水平, 完善“以心态优化体育参与”的理论体系。

**关 键 词:** 社会心态; 潜在剖面分析; 民生三感; 体育参与行为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6)05-0056-11

## Differentiation of differences in three senses of urban-rural livelihood and spor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ople-centered”

FAN Rong<sup>1</sup>, SUN Changrong<sup>1</sup>, HU Yue<sup>2</sup>, XUE Wenhao<sup>1</sup>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Wuhan 430070, China;

2.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Tianjin University of Sport, Tianjin 300202, China)

**Abstract:** Integrating sports into a part of people's promising life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promoting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and also a core purpos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ntality and spor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amo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Does a higher level of social mentality necessarily lead to greater sports participation? Using three waves of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 $N = 26\,338$ ),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 to identify latent profiles of “three senses of people's livelihood”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amo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also compared differences in sports participation across different group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senses was more pronounced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xhibited relatively homogeneous patterns. Among the balanced-profile groups, the medium-level three sense group demonstrated the highest level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followed by the high-level group, while the medium-low-level group showed the lowest level. But, after excluding non-participants,

收稿日期: 2026-01-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23FTYA005)。

作者简介: 樊荣(1989-), 男,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体育心理学。E-mail: fanrong@cug.edu.cn

the pattern among urban residents was reversed, with the high-level group of three senses displaying a clear advantage, whereas the results for rural residents remained unchanged. Among the unbalanced-profile groups, the happiness-dominant group exhibited the highest level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followed by the happiness-deficient group, while the low-level group ranked lowest, and these findings remained stable after non-participants were excluded.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ports policies of urban and rural should avoid 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and instead adopt strategies tailored to the social ment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population groups, and greater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fostering a more balanced and higher level of “three senses of people’s livelihood” by strengthening the link between individuals’ life opportunity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Meanwhile, reducing participation barriers among high-mentality groups and improving the alignment between life expectations and lived experiences among groups with unbalanced mentality profiles may further enhance sports participation. Within a medium-level social mentality framework, incorporating “three senses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to research on sports stratification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disparities in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social mentality.

**Keywords:** social mentality;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three senses of people’s livelihood; spor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有效提升国民体育参与水平,是体育强国战略推进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国外体育分层研究以韦伯和布迪厄的社会阶层理论为起点,逐步发展成体系。我国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围绕不同社会阶层的体育参与差异开展了大量分析,并提出了促进策略。起初,学界多聚焦“宏观结构”和“微观心理”2个视角,前者更多关注社会资本、空间、收入、受教育水平等社会经济地位要素,重点讨论社会结构对个体体育参与机会的约束;而后者则是围绕自我效能感、认知能力等心理要素,重点讨论个体自由选择对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然而,有学者指出单一视角难以全面解释差异机制。正如健康社会学理论强调,个体行为同时受自身心理认知和宏观社会结构的双重约束<sup>[1]</sup>。由此,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合视角”渐成共识。已有研究分别从职业与健康感知<sup>[2]</sup>、社会支持与心理动力因素<sup>[3]</sup>等方面,将外部社会结构与内部个体心理相结合,对整合视角下的体育参与差异进行了有益探索。不过,此类路径也相对忽视了中观群体心理与文化背景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换言之,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对于社会变迁中形成的中观群体心理现象,尤其是社会心态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仍缺乏充分探讨<sup>[4]</sup>,这也构成了当前研究视角的缺口。而有学者指出,中观视角能够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发挥理论勾连作用<sup>[5]</sup>。因此,弥补这一缺口,不仅能构建宏观、中观与微观的3层分析框架,也能从群体心态层面为提高全民体育参与提供以下实践指引:一是明确社会转型中,不同社会心态群体的体育参与差异特征,把握心态与体育参与的关联规律;二是理清个体能否通过调整自身心态优化体育参与行为;三是为政府面向不同心态群体制定差异化体育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当然,居民社会心态并非均匀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sup>[4]</sup>。在我国社会转型阶段,城市性与乡村性的并存,正是当前我国城乡心态格局的客观现实<sup>[6]</sup>。基于此,本研究在分群体探讨居民社会心态的同时,也将其置于地域背景中,进一步围绕以下3个递进问题展开:(1)城乡居民的社会心态具备怎样的差异化特征?(2)在城乡内部,不同社会心态群体的体育参与行为具有怎样的差异?(3)将实证结果结合已有研究,解释城乡居民不同社会心态造成体育参与行为差异的可能机制。

选取合适的社会心态指标成为了研究开展的重要前提。究竟何种社会心态能够准确反映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民众真实的生存与生活现状?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为此提供了重要指引。作为国家高度重视的核心民生指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下简称“民生三感”)已成为学界公认的社会心态指标<sup>[7]</sup>。其既体现了居民在物质保障基础上对美好生活与未来发展的整体判断,也兼顾了物质与精神需求,直观展现了民众现实心态<sup>[8]</sup>。因此,本研究通过民生三感体现我国居民的社会心态,并按照“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思路,开展实证检验。研究数据来自CFPS2018、2020和2022的3期连续调查,覆盖城乡大样本,为分析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经验基础。

##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1.1 民生三感与体育参与行为

民生三感中,获得感代表获取各类社会资源的实际情况,既包含实际所得,也包含个人对自身收益的主观评价<sup>[9]</sup>;幸福感具有跨文化与社会规范的多重属性,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综合主观判断,其既受社会现实状况影响,也作用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sup>[7]</sup>;安

全感则是居民对当下生活状态及未来预期稳定性的主观感知,同时涵盖现实生活保障与精神心理层面<sup>[10]</sup>。

现有研究证实,无论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单一指标<sup>[11-13]</sup>,还是整体水平<sup>[14]</sup>都会显著影响居民的体育参与行为。但民生三感具体作用于体育参与的内在逻辑,仍需要结合社会心态的本质特征来解释。有学者定义,社会心态是指社会成员对自身生活处境与社会发展态势的评判与期待,具有宏观、动态与突生的3大属性<sup>[15]</sup>。宏观性是指“作为一种氛围,能够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动态性则意味着它会“随着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而变化”;而突生性则强调“并非个体心态的简单叠加,而是具有自身独特特征与功能的整体心理现象”<sup>[16]</sup>。王智慧<sup>[17]</sup>与应孜<sup>[18]</sup>等进一步指出,社会心态与体育参与行为之间存在相互构建的关系。一方面,依托宏观性与动态性,体育参与过程中形成的集体共识会作为一种“心理规训”,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体育价值认知,这种整体氛围会在社会大范围扩散,同时伴随社会转型持续变化;另一方面,凭借突生性,当持有相似认知与态度的个体不断聚集,便会形成特征统一的心理群体,并在群体互动中产生超越个体的“突生规范”,把零散的个人体育参与行为,规整成有序的群体性体育参与模式。简言之,社会心态通过宏观层面引导个体、个体聚集形成具有突生规范的群体这2条路径,共同对体育参与行为产生深层影响。这也为本研究探讨不同民生三感群体的体育参与行为差异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 1.2 城乡居民民生三感的群体分化

当前,学界围绕民生三感的群体测量与对比,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早期研究为保证测量的全面性,构建了适用于全国居民的测量工具,为后续群体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sup>[19-20]</sup>。然而,有学者认为仅测量全体国民深度不足,对不同群体的关注同样重要。随后,学者们开始关注农民、城市受救助对象等特定群体,并设计相应的测量工具<sup>[21-22]</sup>,对不同群体开展了良好评估。另外,还有研究结合少数民族城乡样本<sup>[23]</sup>和CFPS全国乡村数据<sup>[24]</sup>开展比较分析,从不同群体视角补充了民生三感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呈现其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化特征。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仍主要停留在不同群体之间三感水平的比较,对群体内部是否存在不同心态类型关注不足,更未探讨不同三感类型对应的行为差异。由此,对民生三感异质性的认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这也导致相关政策只能做到宏观统筹,难以依据民众心态特征实施差异治理。

与此同时,现有民生三感的测量方式也存在不足。现有学者多采用维度叠加方式,分别测量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后,通过均值加总得到民生三感水平。这类“以变量为中心”的群体区分方法,虽适合探讨民生三感的线性关系,却忽视了社会心态的突生性。这种忽视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突生性的核心在于,群体心态不等于各项心理要素的简单相加,属于具备独立特质的群体心理现象;二是对三者进行均值叠加,还会忽略木桶效应,即某一心态短板对整体水平的关键制约作用,难以识别非均衡三感群体,这同样是对突生性的忽视。因此,“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思路可能更贴合民生三感的突生属性。具体而言,作为“以个体为中心”的典型方法,潜在剖面分析(LPA)在分别测量3项指标后,先识别样本中的潜在类型,再依据个体归属概率划分心态群体,能够有效避免因假设样本同质而忽略突生性的问题,更能充分地揭示民生三感内部的均衡与非均衡心态类型群体。

那么,城乡居民内部的民生三感群体分化究竟呈现何种趋势?Granovetter<sup>[25]</sup>的社会嵌入理论与费孝通<sup>[26]</sup>的礼俗-法理社会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社会嵌入理论指出,个体行为深嵌入于社会结构与环境之中。相应地,作为群体心理现象的民生三感,同样是在特定社会情境和互动中形成演化的,这也与王俊秀<sup>[4]</sup>提出的社会心态具有地域差异性的结论一致。由此,城乡居民民生三感分化趋势的差异,本质上可能源于两者社会嵌入形态的不同。按照礼俗-法理框架,城市更接近法理社会,以制度契约为核心,个体依赖自身能力与职业地位获取资源,关系异质性强,因此,三感内部可能分化较大。而乡村则更接近礼俗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个体嵌入熟人网络,宗族互助与邻里支持对心态具有缓冲作用,即使经济条件有别,三感也可能趋于同质,分化程度较低<sup>[27]</sup>。综上,针对问题(1)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H1: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居民的民生三感群体分化差异大;而乡村居民的民生三感群体分化差异小。

## 1.3 城乡民生三感群体的体育参与行为差异

对不同民生三感群体体育参与行为差异的探讨,主要围绕2个问题展开:一是在民生三感均衡发展的群体中,体育参与水平是否会随三感水平同步提升,即高三感优于中三感、中三感优于低三感,且在剔除非体育参与者后,这一趋势是否依然成立;二是在民生三感非均衡发展(某一心态维度偏高或偏低)的群体中,哪一类群体的体育参与表现最优,且在剔除非体育参与者后,该群体的优势是否仍然存在。

在三感均衡发展的群体中,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均处于较高水平的高三感群体,通常反映其整体生活状态更优,具体表现为在物质层面富足,主观感

受满足<sup>[22]</sup>。这也从侧面体现出该群体在宏观结构与微观心理层面均具备的明显优势。从时间地理学(时间与空间)<sup>[28]</sup>、原因理论(收入)<sup>[29]</sup>为代表的“宏观决定论”,以及以自我决定论、健康信念模型<sup>[30]</sup>为代表的“微观选择论”来看,高三感群体在体育参与上具备必然优势,因其宏观结构优势可能为其提供了稳定的参与“机会”,而微观心理优势则直接构成了持续参与的内在“动力”,最终使该群体更有利于进行体育参与。

但随着体育社会分层研究的不断深化,学界逐渐认识到体育参与行为并非由宏观或微观因素单独决定,而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结果。例如,身体活动的社会生态模型指出,个体行为嵌套于微观至宏观的多层系统中,各层次因素相互制约<sup>[3]</sup>;健康社会学理论也强调,社会结构约束与个体主观能动性共同塑造了个体行为<sup>[1]</sup>。因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民生三感与体育参与之间的关联,也从高三感优于中三感,中三感优于低三感的必然推论,转向更为审慎的非必然关联。

以上观点多源于理论梳理的间接推演,而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直接的中观支撑。他指出,行为的关键不在于个体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其是否具备将资源转化为实际选择与行动自由的能力。据此,体育参与作为一种功能性实现,取决于个体能否将宏观结构与微观心理所提供的资源,借助自身转化能力及多重中间因素,落实为实际的体育参与行为。然而,在现实中即便高三感群体在宏观条件与微观心理上具备优势,仍可能受到个体、社会、环境等多重转化因素的限制<sup>[31]</sup>,最终未能实现有效参与。

但这一现象也可能随着非体育参与者的剔除被打破。行为改变论认为,行为发生意味着个体已具备基本的能力与机会<sup>[32]</sup>。对于已经进行体育参与的高三感群体而言,通常已经跨过能力转化的门槛,具备将现有资源转化为体育参与的可行能力。加之马太效应的放大作用,既有优势将持续强化<sup>[33]</sup>。因此,高三感群体的体育参与行为可能依然具有明显优势。

基于这一思路,究竟哪一类群体的体育参与程度更高?边际效用理论提示,民生三感水平对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可能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即适度三感水平的群体反而更易参与<sup>[34]</sup>。既往研究表明,在都市“效率优先”的整体氛围下,部分高三感居民为维持和提升获得感,需承受高强度工作和长时间通勤<sup>[35]</sup>,物质富足可能并未转化为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因而难以参与体育。低民生三感群体则受现实资源与心理动力不足的限制,体育参与更为有限。袁雷<sup>[1]</sup>也提出,

个体的收入与健康行为呈现非线性关系,人们在过度追求更高水平民生三感的过程中,反而可能挤占体育参与的机会。相比之下,民生三感达到一定水平但并未过高的群体,体育参与状况可能更为良好。综上,针对问题(2)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H2:在民生三感均衡发展的群体中,体育参与水平不会随着民生三感的提升而线性上升,适度三感水平群体的体育参与表现更佳;但在跨越“是否参与体育”的门槛后,高三感群体的优势会显著显现,体育参与水平会较其他群体更高。

在三感非均衡发展群体中,体育参与水平可能与三感内在逻辑密切相关。既有研究指出,获得感是安全感与幸福感的基础,安全感是获得感与幸福感的重要保障,幸福感则是前两者的最终体现,这凸显了幸福感在三感中的核心地位。据此推测,幸福感水平可能会主导非均衡群体的体育参与行为。行为决策机制同样支持这一推断,在个体行为形成过程中,情感体验比认知评价对行为具有更直接的驱动作用<sup>[36]</sup>。相比于获得感、安全感分别是对资源与风险环境的认知性判断,幸福感作为更核心的主观情感体验,对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可能更为突出,这一猜想可能在剔除非体育参与者后依然成立。基于上述,针对问题(2)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H3:在民生三感发展非均衡的群体中,幸福感较高群体表现出更积极的体育参与行为。进一步剔除非体育参与者后,这一差异仍然存在。

##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 2.1 样本及数据来源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在2018、2020和2022年对居民民生三感开展了调查。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对重复个体保留最新一次有效观测,对退出个体保留最后一次参与数据,新进入的个体直接使用该年数据。同时剔除18周岁以下无法独立生活的样本,并对缺失及无效回答的样本进行清理,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6338份。从样本结构来看,户籍、年龄及地区分布较为均衡,具有较好的覆盖性。

### 2.2 变量说明及初步分析

#### 1)被解释变量。

体育参与行为,通过参与频率和时长进行测量。其中2018年题项为“过去一周锻炼次数”,0次未参与者记为0,其余记为1。2020与2022年题项为“过去12个月参加体育健身休闲活动的频率”,将“从不参加”记为0,其余选项记为1。

体育参与时长在不同年份的测量方式存在差异,2018年为“过去一周锻炼总时长”,2020年和2022年为“过去12个月单次锻炼时长”。为提高可比性,

将其统一转换为单次体育参与时长(分钟),并剔除超过 300 分钟的极端值。上述处理方式已得到广泛验证与应用<sup>[37]</sup>。

2)解释变量。

本研究在既有三感量表基础上,结合 CFPS 数据中既往学者使用的相关题项进行筛选与修订,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KMO=0.801)确定最终测量结构,共保留 11 个题项(见表 2)<sup>[24]</sup>。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量表 Cronbach's  $\alpha$  为 0.722,处于可接受范围,拟合指标良好( $\chi^2$  (41)=99.87, AGFI=0.956, CFI=0.926, RMSEA=0.061, SRMR=0.0486)。同时, VIF 均低于临界值( $VIF_{Max}$ =1.085),容差在 0.59~0.92 之间,说明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问题,可用于后续分析。

3)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研究的常见做法,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居住地作为控制变量。

4)城乡组间不变性检验。

检验修订后三感量表的测量不变性。构建嵌套模型,依次考察形态(M1)、部分形态(M2)、单位(M3)、部分单位(M4)及尺度(M5)不变性。各模型拟合结果均良好( $\chi^2$  (df)=3381.563(80)~3956.055(98), CFI=0.909~0.922, TLI=0.893~0.901, RMSEA=0.054~0.056, SRMR=0.045~0.048)。各层级之间的  $\Delta$  CFI 均低于 0.01(M1vs.M2=0.002, M1vs.M3=0.001, M3vs.M4=0.000, M3vs.M5=0.01)。同时,在大样本情况下, $\chi^2$  统计量对模型微小偏差较为敏感,往往会导致  $\chi^2$  /df 偏高,通常需要结合 CFI、TLI、RMSEA 及 SRMR 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sup>[38]</sup>。本研究,其他稳健指标均处于可接受范围。综合来看,该民生三感测量工具信效度良好,满足城乡跨组等值性要求,可用于后续比较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具体的描述性统计及修订题目编号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6 338)

| 变量        | 城市           |        |     |     | 乡村           |        |     |     | 题目编号          |
|-----------|--------------|--------|-----|-----|--------------|--------|-----|-----|---------------|
|           | 均值           | 百分比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均值           | 百分比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是否体育参与    | 0.47(0.50)   |        | 0   | 1   | 0.30(0.46)   |        | 0   | 1   | QP701N        |
| 1=有       |              | 46.90  |     |     |              | 29.70  |     |     |               |
| 0=无       |              | 53.10  |     |     |              | 70.30  |     |     |               |
| 全样本体育参与时长 | 29.96(39.26) |        | 0   | 300 | 17.74(38.71) |        | 0   | 300 | QP702N        |
| 体育参与者时长   | 57.48(39.14) |        | 1   | 300 | 59.64(50.4)  |        | 1   | 300 | QP702N        |
| 生活满意获得感   | 3.94(0.91)   |        | 1   | 5   | 4.03(0.97)   |        | 1   | 5   | QN12012       |
| 生活信心获得感   | 4.09(0.91)   |        | 1   | 5   | 4.16(0.95)   |        | 1   | 5   | QN12016       |
| 工作获得感     | 3.70(0.92)   |        | 1   | 5   | 3.72(1.00)   |        | 1   | 5   | QG406         |
| 生活质量幸福感   | 7.39(2.01)   |        | 0   | 10  | 7.35(2.25)   |        | 0   | 10  | QM2011        |
| 生活情绪幸福感   | 3.07(0.89)   |        | 0   | 10  | 3.01(0.94)   |        | 0   | 10  | QN416         |
| 人际幸福感     | 7.00(1.82)   |        | 1   | 4   | 7.11(2.01)   |        | 1   | 4   | QM2011        |
| 公共安全感     | 3.47(0.93)   |        | 1   | 5   | 3.44(0.98)   |        | 1   | 5   | QN1101        |
| 邻里安全感     | 6.54(2.08)   |        | 0   | 10  | 6.76(2.23)   |        | 0   | 10  | QN10022       |
| 社交安全感     | 2.73(2.25)   |        | 0   | 10  | 2.32(2.30)   |        | 0   | 10  | QN10024       |
| 行政安全感     | 5.32(2.52)   |        | 0   | 10  | 5.61(2.76)   |        | 0   | 10  | QN10025       |
| 就医安全感     | 6.83(2.27)   |        | 0   | 10  | 7.06(2.44)   |        | 0   | 10  | QN10026       |
| 年龄        | 44.17(13.97) |        | 18  | 90  | 48.44(15.11) |        | 18  | 93  | birthy        |
| 性别        | 0.52(0.50)   |        | 0   | 1   | 0.53(0.50)   |        | 0   | 1   | gender        |
| 1=男       |              | 47.60  |     |     |              | 46.90  |     |     |               |
| 0=女       |              | 52.40  |     |     |              | 53.10  |     |     |               |
| 居住地       | 2.09(1.07)   |        | 1   | 4   | 2.22(0.96)   |        | 1   | 4   | province_code |
| 1=东部      |              | 25.90  |     |     |              | 39.90  |     |     |               |
| 2=西部      |              | 37.70  |     |     |              | 23.60  |     |     |               |
| 3=中部      |              | 24.90  |     |     |              | 23.70  |     |     |               |
| 4=东北部     |              | 11.50  |     |     |              | 12.80  |     |     |               |
| 受教育程度     | 3.42(2.07)   |        | 1   | 9   | 3.70(2.83)   |        | 1   | 9   | BC5           |
| 数据年份      |              |        |     |     |              |        |     |     | cyear         |
| 2018      |              | 14.50  |     |     |              | 16.40  |     |     |               |
| 2020      |              | 21.30  |     |     |              | 23.30  |     |     |               |
| 2022      |              | 64.20  |     |     |              | 60.30  |     |     |               |
| 观测值       |              | 13 269 |     |     |              | 13 069 |     |     | 共计 26 338     |

3.2 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对主要变量进行了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民生三感各维度内部相关性较强(城市:  $r=0.09\sim0.57$ ,  $P<0.05$ ; 乡村:  $r=0.08\sim0.52$ ,  $P<0.01$ )。但民生三感与体育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较弱, 个别系数未达显著水平, 城乡趋势基本一致。具体而言, 城乡居民的体育参与频率与三感各维度均呈显著弱相关(城市:  $r=0.01\sim0.12$ ,  $P<0.05$ ; 乡村:  $r=0.01\sim0.07$ ,  $P<0.01$ ), 体育参与时长与三感各维度的相关趋势也呈显著的弱相关(城市:  $r=0.01\sim0.07$ ,  $P<0.05$ ; 乡村:  $r=0.00\sim0.05$ ,  $P<0.01$ )。

3.3 城乡民生三感的潜在剖面确认

运用 Mplus 8.3 软件对民生三感的 Z 分数开展潜在剖面分析, 估计方法选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MLR),

并结合多项指标确定最优类别数目。一是 AIC、BIC 与 aBIC 3 类信息准则, 数值越小, 代表模型拟合效果越好; 二是当 LRT 以及稳定性更佳的 BLRT 检验结果显著时, 说明当前分类优于类别更少的上个模型; 三是分类熵值(Entropy)的数值越靠近 1, 代表样本归类的精准度越高。

不同剖面模型的拟合指标见表 2。从 3 分类模型开始, 逐步增加剖面数量( $k$ )进行拟合比较。结果显示, 从 5 分类模型开始, 熵值趋近并超过 0.80, 分类准确性较高。在 6 分类时, 模型区分度进一步增强, 故确定 6 分类为城市组的最优类别数。同理, 在乡村组中, 5 分类到 6 分类的拟合指标出现明显提高, 表明模型分类接近良好。因此, 综合考虑模型的拟合质量和分类简洁性, 最终确定 6 分类为城乡 2 组的最优剖面数量。

表 2 民生三感 3-8 剖面的拟合指数<sup>1)</sup>

| 城市剖面<br>(N=13269) | Log-likelihood      | AIC                | BIC                | SSA-BIC            | Entropy      | BLRT                          |
|-------------------|---------------------|--------------------|--------------------|--------------------|--------------|-------------------------------|
| 3                 | -197 043.594        | 394 179.188        | 394 523.874        | 394 377.691        | 0.716        | 3 875.822 <sup>2)</sup>       |
| 4                 | -195 057.823        | 390 231.646        | 390 666.251        | 390 481.932        | 0.731        | 3 971.542 <sup>2)</sup>       |
| 5                 | -194 265.409        | 388 670.818        | 389 195.341        | 388 972.888        | 0.750        | 1 584.828 <sup>2)</sup>       |
| 6                 | <b>-193 334.325</b> | <b>386 832.650</b> | <b>387 447.091</b> | <b>387 186.503</b> | <b>0.795</b> | <b>1 862.168<sup>2)</sup></b> |
| 7                 | -182 026.723        | 364 241.446        | 364 945.805        | 364 647.082        | 0.891        | 2 070.568 <sup>2)</sup>       |
| 8                 | -180 861.252        | 361 934.504        | 362 728.782        | 362 391.924        | 0.882        | 1 844.053 <sup>2)</sup>       |
| 乡村剖面<br>(N=13069) |                     |                    |                    |                    |              |                               |
| 3                 | -194 506.809        | 389 105.618        | 389 449.606        | 389 303.423        | 0.697        | 3 716.550 <sup>2)</sup>       |
| 4                 | -192 828.369        | 385 772.738        | 386 206.462        | 386 022.144        | 0.723        | 3 356.880 <sup>2)</sup>       |
| 5                 | -192 076.483        | 384 292.965        | 384 816.425        | 384 593.972        | 0.746        | 1 503.773 <sup>2)</sup>       |
| 6                 | <b>-182 189.673</b> | <b>364 543.347</b> | <b>365 156.542</b> | <b>364 895.955</b> | <b>0.933</b> | <b>1 559.406<sup>2)</sup></b> |
| 7                 | -181 351.566        | 362 891.131        | 363 594.063        | 363 295.341        | 0.903        | 1 676.215 <sup>2)</sup>       |
| 8                 | -180 503.398        | 361 218.797        | 362 011.465        | 361 674.607        | 0.879        | 1 696.335 <sup>2)</sup>       |

1)粗体指最终符合拟合指标与现实意义的剖面数; 2) $P<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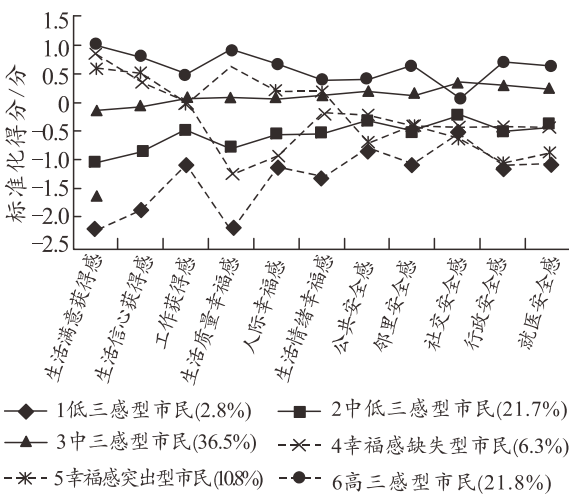


图 1 城市组别民生三感的潜在剖面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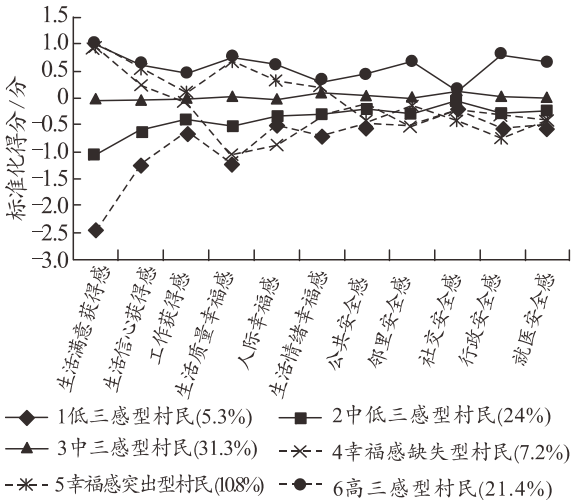


图 2 乡村组别民生三感的潜在剖面分析

图 1 与图 2 呈现了城乡居民民生三感异质类型的潜在剖面走向。根据每类剖面的均值分布趋势,可初步对各类剖面加以解释与命名。需要说明的是,研究所使用的类型命名主要为描述性标签,意在概括其社会心态特征,辅助理解民生三感异质性结构,并非对应具体社会身份群体。

根据城乡居民的分类均值,本研究将 6 类居民分别命名为:(1)低三感型市民(2.8%)或村民(5.3%)(城市: $M=-2.24\sim-0.51$ ;乡村: $M=-2.46\sim-0.22$ ),此类居民的民生三感处于最低水平;(2)中低三感型市民(21.7%)或村民(24.0%)(城市: $M=-1.02\sim-0.21$ ;乡村: $M=-1.06\sim-0.03$ ),此类居民的三感水平偏低,但结构稳定、波动较小;(3)中三感型市民(36.6%)或村民(31.3%)(城市: $M=-0.14\sim0.35$ ;乡村: $M=-0.04\sim0.14$ ),此类居民的民生三感处于中等水平,也是城乡占比最高的群体;(4)幸福感缺失型市民(6.3%)或村民(7.2%)(城市:获得感  $M=0.02\sim0.84$ ,幸福感  $M=-1.22\sim-0.16$ ,安全感  $M=-0.42\sim-0.20$ ;乡村:获得感  $M=-0.04\sim1.00$ ,幸福感  $M=-1.06\sim-0.30$ ,安全感  $M=-0.53\sim-0.11$ ),该类居民的获得感与安全感相对较高,但幸福感显著偏低;(5)幸福感突出型市民(10.8%)或村民(10.8%)(城市:获得感  $M=-0.01\sim0.60$ ,幸福感  $M=0.21\sim0.66$ ,安全感  $M=-1.04\sim-0.36$ ;乡村:获得感  $M=0.13\sim1.00$ ,幸福感  $M=0.24\sim0.72$ ,安全感  $M=-0.71\sim-0.13$ ),该类居民幸福感较高,但部分获得感与安全感偏低;(6)高三感型市民(21.8%)或村民(21.4%)(城市: $M=0.08\sim0.99$ ;乡村: $M=0.14\sim1.00$ ),该类居民民生三感的整体得分较高。类别特征表明,类别 2、3、6 的民生三感相对均衡发展,类别 1、4、5 的民生三感非均衡发展,城乡各剖面类型在三感维度上的分布模式基本一致。

后续分别针对城市和乡村样本,使用 Welch 检验,对比 6 类群体的民生三感差异。结果表明,城市样本(偏  $\eta^2=0.935$ ,  $F(5)=6833.8$ )和乡村样本(偏  $\eta^2=0.834$ ,  $F(5)=3505.2$ )的组间差异均具备统计学意义,证明本次划分的群体类型,可以有效反映民众三感组合模式。组间对比结果可见,城市组各类群体的区分程度明显高于乡村组别( $\Delta \eta^2=0.100$ , 95% CI[0.087, 0.113]),表明市民各类心态群体的界限更加清晰。因此,市民的类型差异更加明显,而村民的整体心态更为趋同。该结果支持 H1 的假设。

### 3.4 城乡居民民生三感与体育参与频率的差异

对城乡各类民生三感群体体育参与频率的组间检验结果显示,城市、乡村内部不同心态群体的参与情况均存在统计学层面的明显差距(城市: $\chi^2=252.938$ ,  $P<0.001$ , Cramer's  $V=0.138$ ;乡村: $\chi^2=89.520$ ,  $P<0.001$ ,

Cramer's  $V=0.083$ )。

其中,城乡体育参与频率偏低的人群均为低三感型(城市:34.0%;乡村:24.1%)和幸福感缺失型(城市:31.2%;乡村:22.5%);城市参与度最高的组别则为中三感型(54.4%)和高三感型市民(46.7%),乡村高参与率的群体则包括中三感型(34.7%)、中低三感型(29.1%)和高三感型村民(28.5%)。不难看出,高三感群体在体育参与行为的优势都未显现,部分验证了假设 H2。

在非均衡三感群体中,城乡幸福感突出型居民(城市:42.4%;乡村:26.8%)均明显高于幸福感缺失型居民(城市:31.2%;乡村:22.5%),假设 H3 同样得到部分验证。

### 3.5 城乡居民民生三感与体育参与时长的差异

Levene 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表明,城市与乡村 2 组方差不齐( $F=64.05$ ,  $P<0.001$ ),据此采用 Welch 校正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完成全样本的体育参与时长组间对比。结果发现,城乡居民具有明显区别( $t(26\ 336)=-19.21$ ,  $P<0.001$ , 95% CI[-0.26, -0.21])。随后,对城乡组内分别进行方差分析后发现,2 组 6 类心态群体的参与时长差距显著(城市: $F(52\ 430.3)=20.73$ ,  $P<0.001$ ;乡村: $F(53\ 553.4)=7.18$ ,  $P<0.001$ )。

事后比较结果(见表 3)进一步揭示,在城市组中,中三感型与高三感型市民的体育参与时长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市民,且中三感型高于高三感型市民;低三感型与幸福感缺失型市民的参与时长最低;幸福感突出型与中低三感型市民处于中等水平,且均显著高于幸福感缺失型市民。在乡村组中,中三感型村民的体育参与时长最高,其次为幸福感突出型与高三感型村民;幸福感缺失型村民的参与时长最低,显著低于其他类型。特别指出的是,城乡组别中幸福感突出型市民都显著高于幸福感缺失型市民。综合结果来看, H2、H3 的假设得到支持。

剔除完全不参与体育活动的样本后,再次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城乡 2 组数据仍表现为方差不齐( $F=67.21$ ,  $P<0.001$ ),故而依旧使用 Welch 校正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比 2 组的体育参与时长。结果发现,城乡 2 组居民的体育参与时长仍具备统计学差异( $t(6\ 760)=2.28$ ,  $P<0.05$ , 95% CI[0.31, 4.03])。随后,分别对城乡组内部分别进行方差分析后发现,2 组 6 类心态群体的参与时长差距显著(城市: $F(5\ 816.05)=4.24$ ,  $P<0.001$ ;乡村: $F(53\ 879)=3.96$ ,  $P<0.01$ )。

事后比较分析(见表 3)显示,在城市体育参与者中,高三感型与幸福感突出型市民的体育参与时长显著高于中三感型市民,其余组别间差异无统计显著性;在乡村组中,幸福感突出型村民的体育参与时长显著

高于中低三感型与中三感型村民。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H2、H3。

表 3 结果的平均差异和两两差异的总体显著性检验

| 城市组别<br>(N=13 269)              | 全样本体育参与<br>时长均值                                                | 仅体育参与者<br>时长均值 | 乡村组别<br>(N=13 069)             | 全样本体育参与<br>时长均值                              | 仅体育参与者<br>时长均值 |
|---------------------------------|----------------------------------------------------------------|----------------|--------------------------------|----------------------------------------------|----------------|
| 1 低三感型市民<br>(N=362; N=123)      | 19.9(37.9)                                                     | 58.4(44.4)     | 1 低三感型村民<br>(N=692; N=167)     | 14.9(38.4)                                   | 61.9(56.7)     |
| 2 中低三感型市民<br>(N=2 880; N=1 219) | 24.3(38.7)                                                     | 57.4(40.4)     | 2 中低三感型村民<br>(N=3 141; N=915)  | 16.7(36.9)                                   | 57.2(48.2)     |
| 3 中三感型市民<br>(N=5 018; N=2 728)  | 30.0(37.8)                                                     | 55.2(40.7)     | 3 中三感型村民<br>(N=4 086; N=1 416) | 19.9(39.9)                                   | 57.3(49.5)     |
| 4 幸福感缺失型市民<br>(N=826; N=258)    | 18.3(38.5)                                                     | 58.7(48.7)     | 4 幸福感缺失型村民<br>(N=945; N=213)   | 13.2(33.3)                                   | 58.3(47.8)     |
| 5 幸福感突出型市民<br>(N=1 348; N=572)  | 26.0(41.6)                                                     | 61.4(43.7)     | 5 幸福感突出型村民<br>(N=1 372; N=368) | 18.4(41.2)                                   | 68.7 (53.5)    |
| 6 高三感型市民<br>(N=2 835; N=1 325)  | 28.1(41.0)                                                     | 60.2(40.7)     | 6 高三感型村民<br>(N=2 833; N=806)   | 17.7(39.2)                                   | 62.3(51.3)     |
| 两两比较的显著性<br>$P<0.05$            | 5>4; 2>4; 3>1;<br>3>5; 3>4; 3>2;<br>6>1; 6>4; 6>2;<br>5>1; 3>6 | 5>3; 6>3       | 两两比较的显著性<br>$P<0.05$           | 3>1; 3>2; 3>4;<br>6>4; 5>4; 3>6;<br>2>4; 5>1 | 5>2; 5>3       |

4 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其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民生三感是反映居民社会生活质量与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为城乡体育分层问题提供了中观解释视角。该指标有助于理解个体在条件与动机之间的行为转化机制,并进一步拓展体育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边界。同时,通过对不同社会心态类型及其行为差异的识别,可以为理解城乡体育参与的不平衡现象提供经验依据。

4.1 城乡民生三感的群体分化趋势

基于城乡居民潜在剖面分析结果可见,市民的民生三感分化差异大,更契合法理社会特征;村民的民生三感则更为同质,更贴近礼俗社会特征。这说明社会心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该结论从实证层面验证了社会心态的地域差异与社会嵌入性,突破了以往纯理论推演的局限。

这一发现也进一步表明,体育参与行为在城乡之间可能存在双轨的生成逻辑:城市更多表现为群体分化下的个体属性,乡村则更倾向于整体趋同的群体性参与模式。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体育领域相关政策不宜“一刀切”,而应结合社会转型中居民的实际心态分化特征,因地制宜、因群施策,实现从“城乡简单区域差异治理”向“城乡特点精准适配治理”的转型。

4.2 城乡民生三感均衡发展群体的体育参与行为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民生三感均衡发展的城乡居民中,中三感型群体的体育参与表现优于高三感型群体,这与传统经验主义中的“民生三感越高,资源条件越好,体育参与越充分”的判断相悖。从基本理论来看,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常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自身状态<sup>[39]</sup>。中三感群体处于中间水平,既可通过向上比较激发参与动力,也可通过向下比较强化自我认同,在双重比较下维持较好的体育参与。而高三感群体因自身水平较高,可能难以具有向上比较的参照,最终体育参与表现反而不及中三感群体。

从中观社会心态的视角来看,高三感群体的体育参与未必占优,可能是一种心态对另一种心态约束的结果。对高三感群体而言,由阶层身份与审美标准形成的“身份心态”,会内在阻碍其民生三感转化为实际体育参与。这一逻辑与炫耀理论、阶层选择论<sup>[40]</sup>、时尚等级论高度一致,即不同阶层会倾向选择与自身身份匹配的运动方式。王智慧<sup>[17]</sup>的研究也指出,经济快速发展提升了物质生活水平,但精神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在社会交往日趋世俗化、工具化的社会心态影响下<sup>[41]</sup>,高民生三感群体虽拥有更好的资源条件,却常把体育参与异化为彰显身份、维护阶层地位的象征性活动。比如他们更偏好私教、高端健身场所,而非广场舞、公共健身设施。这类带有表演性质的体育参与,看似是个人选择,实则源于担心“掉价”或“丢失身

份”的深层心态,此类心态通常会抑制体育参与行为的发生,因而缺乏持续性与内在自主性,难以形成稳定的生活方式。汤森德<sup>[42]</sup>的相对剥夺理论也对此提供了支撑,相对剥夺的核心正是“无法体面生活”所带来的羞耻感。这种心态约束使得部分高三感群体难以摆脱“孔乙己的长衫”,放下“身份包袱”,这也成为其体育参与表现并不突出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中三感群体的社会心态更为平和稳定,既没有强烈的阶层焦虑,也较少被功利化逻辑束缚,更容易在体育参与中获得归属感与愉悦感,因此体育参与反而更加积极与持久。

但是全样本分析显示,除中三感型群体呈现出一定的反向特征外,其余群体的体育参与总体上仍符合“民生三感水平越高,体育参与越具优势”的经验规律。尤其在剔除非体育参与者后,市民的结果出现明显反转,高三感群体的体育参与水平重新表现出显著优势,而村民并未出现这一反转。这表明,在城市组中民生三感的均衡提升确实为体育参与提供了积极的心态基础,而这种心态能否跨过“是否参与”的门槛,转化为实际的体育参与行为,对提升全民体育参与至关重要。但在乡村,村民仍可能受限于体育设施供给不足等客观条件<sup>[43]</sup>,难以实现从资源、心态再到参与行为的顺畅转化。因此,只有使现实生活机会与个体心理状态有效耦合,形成更高层次的社会心态,并针对性破除高心态群体的参与制约、引导其主动参与,才能真正推动形成稳定且持续的体育参与行为。

#### 4.3 城乡民生三感非均衡发展群体的体育参与行为

在城乡发展不均衡的民生三感群体中,幸福感突出型群体的体育参与水平显著高于幸福感缺失型,而2类群体的主要差异在幸福感维度上。从理论上讲,期望价值理论强调,个体是否采取某种行为,不仅受到行为结果预期的影响,还取决于其对行为价值的主观判断。幸福感作为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整体评价,会影响其对生活意义和行为价值的认知。当个体对当前生活持有更积极的评价时,更容易将体育活动视为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生活方式,并表现出更高的参与意愿和持续投入的可能性。这一结果同样能够得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解释。随着生理和安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个体会将关注点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幸福感正是这些需求满足程度的重要体现,也是个体积极行动的重要心理基础。值得关注的是,在剔除从不参与体育活动的个体后,城乡幸福感突出型群体仍保持较高的体育参与水平,甚至超过了中三感型群体。这意味着在我国致力于促进民生三感协同提升的大趋势下,对于三感发展尚未实现均衡的群体而言,幸福感

可能是影响体育参与最直接,也是最敏感的心理因素。因此,在促进民生三感整体提升的同时,优先改善居民生活体验,或许能够更有效地激发其体育参与积极性。

综上所述,社会心态培育与体育事业发展均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并在党的多次重要会议中得到明确部署,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与政策引导也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近年来,我国将乡村振兴与全民健身战略协同推进,专门出台《推进“十四五”农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体育赛事、健身设施与指导服务向乡村下沉,加快构建覆盖广泛的乡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在重点帮扶县优先配置体育器材,依托中国农民丰收节等平台开展乡村体育赛事等具体举措,乡村居民体育参与水平持续提升,呈现出逐步向城市靠拢的积极态势<sup>[44]</sup>。

因此,在推进城乡体育资源均衡配置的过程中,应以社会心态为导向,聚焦不同群体的现实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因群施策,方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城乡融合的体育强国目标。

## 5 结论

本研究以中观社会心态视角,探讨了城乡居民民生三感的结构特征,并分析了不同心态群体的体育参与行为差异。结果发现:(1)市民的民生三感分化程度较高,村民的民生三感相对同质。(2)城乡内部不同三感群体之间的体育参与水平均呈现显著差异。(3)在民生三感均衡发展的群体中,中三感型群体的体育参与水平最优,高三感型次之,中低三感型最低。在剔除非体育参与者后,该结果在城市组出现反转,高三感群体表现出显著优势,而乡村组未出现这一变化。(4)在民生三感非均衡发展的群体中,幸福感突出型群体体育参与水平最高,幸福感缺失型次之,低三感型最低,且这一结果在剔除非参与者后依然显著。

综上,在我国坚持以民生为本、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背景下,居民的生活状态与社会心态都在发生深刻变化。高层次的心态是否必然会带来更高水平的体育参与?本研究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一结论清晰揭示了社会心态在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行为之间的中观联结作用,拓展了体育分层研究的中观心态视角,为体育促进政策构建了“以心态优化提升体育参与”的理论路径,也为民生建设与全民体育参与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推动社会心态研究与体育行为研究深度融合。同时,本研究充分考虑社会心态的突生性特征,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思路,使社会心态测量更为严谨,也为现实中因地制宜、因群施策,提升国民体育参与水平提供了可行路径。更

重要的是,本研究回应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战略要求。通过改善民生三感、培育积极社会心态,体育参与有望从“少数人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多数人的日常实践”,真正绘就“让体育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伟蓝图。

## 6 建议

### 6.1 增强市民的现实体育参与能力

高三感群体在参与体育活动后,会展现明显的参与优势。因此,结合城市社会心态分化差异大的特征,体育资源供给也应考虑个体需求,创造便利条件,鼓励其主动参与。

### 6.2 乡村体育资源供给和参与时机的优化

考虑到乡村社会心态分化差异小,集体特征明显的情况,在供给基层体育设施的同时,应结合节庆、集市和农闲等场景时机,拓展村民以集体形式多参与体育。

### 6.3 关注幸福感缺失及低三感群体的心态建设

研究表明,幸福感突出型群体在城乡居民均表现出较高的体育参与水平。因此,对于幸福感缺失,民生三感处于中低水平的居民,应更加重视其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缓解生活压力,构建更加均衡的高层次社会心态,为体育参与提供持续动力。

### 6.4 以社会心态优化促进城乡体育融合发展

城乡居民在社会心态结构和体育参与特征上的差异表明,体育治理不仅需要关注资源配置,还应重视不同群体的心理需求,更要顾及可行能力的转化。通过实施差异化的支持策略,增强城乡居民的共同参与和互动联系,逐步弱化社会心态分层带来的参与差异。在此基础上,推动城乡体育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城乡体育融合水平。

## 参考文献:

[1] 董德朋. 生命历程视角下居民体育参与打破了健康的阶层不平等吗?: 基于 CHNS 追踪调查的纵向分析[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5(8): 73-86.

[2] 袁雷, 孙卓, 汪毅. 职业分化对居民体育参与的影响: “努力赚钱”抑或“主动健康”? [J].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 2024, 48(12): 60-71.

[3] 郭璐, 毛志雄. 城市成年人锻炼的心理动力因素: 潜在剖面分析[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3, 46(3): 110-120.

[4] 王俊秀. 社会心态: 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1): 104-124+244.

[5] 杨海晨, 沈柳红. 类型化: 一个体育人类学中观议题的缘起、意义及实践[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7, 34(3): 275-280.

[6] 吴越, 孙弋炜. 城乡性: 探索城乡融合社会的心态秩序[J].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168-187.

[7] 王俊秀. 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心态的培育[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5(5): 11-15.

[8] 张青卫.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1, 34(3): 51-58+158.

[9] 侯静. 社会转型中社会心态的理论内涵、逻辑建构及变迁[J]. 北京社会科学, 2022, 37(4): 117-128.

[10] 商梦雅, 李江. 乡村宅基地制度对农户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4): 60-71.

[11] 陈元欣, 邱茜. 我国体育场馆公共服务居民获得感的时代意蕴、内涵特征、评价维度及其应用[J]. 体育科学, 2020, 40(9): 14-25+52.

[12] 马超, 石振国, 王先亮, 等. 体育活动与幸福感的互促互进: 基于大学生同伴关系与自我认知的中介效应[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2, 30(6): 893-899.

[13] 杨敏. 我国西部社会体育服务质量与体育锻炼意愿关系的实证研究[J]. 体育科学, 2012, 32(11): 34-39+49.

[14] 王慧娴, 刘筱喆. Citywalk 何以“出圈”? ——青年城市漫步中“三感”的评价、检验及提升[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4, 43(5): 43-58.

[15] 周晓虹. 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 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4): 1-23+242.

[16] 杨宜音.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 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 社会学研究, 2006, 21(4): 117-131+244.

[17] 王智慧. 解组与重构: “健康中国”背景下的社会心态适应——基于大众体育参与的分析[J]. 体育与科学, 2020, 41(2): 20-30.

[18] 应孜, 周义义, 沈建敏. 公众参与体育健身的行为机理与媒介引导策略研究[J]. 体育与科学, 2023, 44(6): 101-106.

[19] 郑建君. 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测量与现状——兼论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的关系[J]. 政治学研究, 2020, 36(6): 89-103+127-128.

[20] 段忠贤, 吴鹏. “民生三感”测评指标体系构建及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24): 171-175.

[21] 万艾琳, 庄天慧, 杨浩. 共同富裕视域下生计资本对农民“三感”的影响[J]. 世界农业, 2024, 46(1):

92-103.

[22] 路锦非. 社会救助中的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实证调查[J].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44(3): 60-70.

[23] 范召全, 张华志, 刘勇. 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涉藏地区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城乡社区居民社会支持现状的调查分析[J]. 民族学刊, 2022, 13(2): 19-26+135.

[24] 刘红, 陈红, 王飞. 数字乡村建设是否提升了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J]. 世界农业, 2025, 47(1): 5-17.

[25]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26]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7] 廖上兰, 吴玉华, 肖锋, 等. 民俗体育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及路径研究[J]. 体育科学, 2020, 40(11): 31-41.

[28] 金银日, 姚颂平, 蔡玉军. 上海市居民休闲体育时空行为特征研究[J]. 体育科学, 2015, 35(3): 12-19.

[29] 方秀宠, 孙东辉, 李维希, 等. 吉林省低收入人群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6, 21(1): 24-26.

[30] ROSENSTOCK I M, STRECHER V J, BECKER M H.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health belief model[J]. 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 1988, 15(2): 175-183.

[31] TILL M, ABU-OMAR K, FERSCHL S, et al. Measuring capabilities in health and physical activity promotion: A systematic review[J]. BMC Public Health, 2021, 21(1): 353.

[32] MICHIE S, VAN STRALEN M M, WEST R. The behaviour change wheel: A new method for characterising and designing behaviour change interventions[J]. Implementation Science, 2011, 6(1): 42.

[33] TOL R S J. The Matthew effect for cohorts of

economists[J].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13, 7(2): 522-527.

[34] AHL R E, COOK E, MCAULIFFE K. Having less means wanting more: Children hold an intuitive economic theory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J]. Cognition, 2023, 234: 105367.

[35] GIURGE L M, WHILLANS A V, WEST C. Why time poverty matters for individuals, organisations and nations[J].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0, 4(10): 993-1003.

[36] SCHWARZ N, CLORE G L. Mood, misattribution, and judgments of well-being: Informative and directive functions of affective stat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 45(3): 513.

[37] WANG J K, SHAO Y R, GUO L, et al. Personality profiles and exercise behaviour across adulthood[J].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24, 18(7): e12989.

[38] HU L, BENTLER P M.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J].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999, 6(1): 1-55.

[39]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J]. Human Relations, 1954, 7(2): 117-140.

[40] STEMPEL C. Adult participation sports as cultural capital: A test of Bourdieu's theory of the field of sports[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005, 40(4): 411-432.

[41] 王智慧. 失范抑或常态: 理解转型期体育文化及伦理信念失范的一个视角[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7(5): 79-86.

[42] DOS SANTOS T M. Poverty as lack of capabilities: An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 of poverty of Amartya Sen[J]. PERI, 2017, 9(2): 125-148.

[43] 郭修金, 杨向军, 朱传耿, 等. 我国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研究[J]. 体育学刊, 2024, 31(3): 48-58.

[44] 王富百慧. 中国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 1995—2020年[J]. 体育科学, 2022, 42(11): 19-26.